



李志德 ◎ 著

市场机制 与产品质量发展

Market Mechanisms and
Product Quality Development

理论与实证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市场机制 与产品质量发展

Market Mechanisms and
Product Quality Development

理论与实证研究

李志德 ◎ 著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 李志德著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3

ISBN 978 - 7 - 5668 - 1159 - 2

I . ①市… II . ①李… III . ①市场机制—研究—中国 ②产品质量—研究—中国 IV . ①F123. 9 ②F27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573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5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3. 25

字 数：254 千

版 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36. 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产品质量问题却日渐凸显，并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公共问题。系统地研究中国产品质量发展问题，需要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解释：

问题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否意味着中国产品质量水平呈倒退趋势，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在统计上是否显著？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企业的“败德行为”，还是因为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风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仅仅是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所致，还是外在的系统性质量问题造成的？

问题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之一，是逐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以提高经济活力。那么，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信息机制等市场机制在实现产品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其作用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问题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需求指的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产品意味着厂商需付出更高的成本，消费者也因此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如果因产品质量标准过高而超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难以形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导致企业因无法获利而没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呈现“二元”分布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差异对于产品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约束作用？

问题四：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政府严加管理，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奶制品市场监管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与政府的质量监管是什么关系？政府质量监管不够严格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加强监管？是因为政府有意不作为，还是缺乏监管能力，或是有别的原因？政府的质量监管与尊重市场逻

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有效平衡？

本书正是在思考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寻找较为满意的答案。本书以“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作为选题，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现有产品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现状，探索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设计出适合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模式，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然而，产品质量问题是世界各国公认的难题，理论上还存在许多未知领域，让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产品质量发展，为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志德

2014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产品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 15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15
- 第二节 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22
- 第三节 关于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 47

第三章 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 53

- 第一节 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产品质量供需均衡 53
- 第二节 关于产品供给总量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66
- 第三节 关于价格因素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72

第四章 竞争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 85

- 第一节 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内涵、特点及其实现条件 85
- 第二节 垄断或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厂商的质量决策 88
- 第三节 竞争机制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 91
- 第四节 关于竞争机制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96

第五章 信息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 107

- 第一节 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107
- 第二节 产品质量信息供求机制及其动态变化 109
- 第三节 关于信息机制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119

第六章 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 125

- 第一节 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的供给和需求 125
- 第二节 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供需均衡的影响 130

第三节 关于收入分配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136

/第七章 ■ 主要发达国家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147

第一节 德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 147

第二节 美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 156

第三节 日本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 162

/第八章 ■ 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 173

第一节 产品质量发展自运行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173

第二节 政府对产品质量发展进行干预的形式 177

第三节 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 180

/第九章 ■ 结语 193

/参考文献 ■ 196

/后记 ■ 204

第一章

绪 论

产品质量发展既是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应对新时期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其重要性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我国产品质量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需求的日趋多样化，产品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对产品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探索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是实现产品质量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章将重点论述以下几方面内容，即提出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理清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最后总结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 研究背景

1. 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应对新时期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加入 WTO 后，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充斥着国际市场。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4 亿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41 600 亿美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然而，在我国贸易总量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产品质量发展的风险。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需求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产品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为发达国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便利，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优良的技术研发水平和有效的制度支持，在优质产品的供给以及产业链的分工上占据了制高点。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便利使得资本、产品、服务的跨国（或地区）流动日益频繁，传统以国家（或地区）地理疆界为基础的经济总量核算，难以反映经济剩余分配、技术水平、环境污染等质量发展问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研究，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29，而且数据显示，虽然中国在过去五年里一直保持着前 30 名

的位置，但主要是靠要素和市场规模拉动，而诸如公信力、商业道德标准、商品市场效率等代表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还比较落后。^①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我国贸易总量虽然很大，但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着贸易增长方式相对粗放、核心竞争力不强、出口产品层次偏低、尚未形成一大批能够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企业等问题。^② 尤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产品质量为由限制我国产品出口，质量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提升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产品竞争实力，促进产品质量发展，将是我国应对新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 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逐步告别短缺经济，人们开始关注产品质量问题。但是，近年来我国产品领域的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③ 严重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信心，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对质量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 年全国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702 484 件，其中涉及产品质量问题的（含质量安全、假冒、虚假宣传等问题）约占 47%。^④ 这说明，产品质量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民生的重大公共社会问题，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产品质量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重要标尺，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国家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产品质量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水平。如果产品质量水平不高，尤其是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势必会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甚至会引发信用危机和社会动荡，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产品质量发展，坚持以质取胜，实现经济社会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产品质量问题却日渐凸显，并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公共问题。系统地研究中国产品质量发展问题，需要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发

^①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 – 2012,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CR_Report_2013-14.pdf.

^②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质量竞争力.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③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如山东“多宝鱼事件”、“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

^④ 数据来源：<http://www.cca.org.cn/web/xfxx/picShow.jsp?id=66799>.

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否意味着中国产品质量水平呈倒退趋势，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在统计上是否显著？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企业的“败德行为”，还是因为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风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仅仅是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所致，还是外在的系统性质量问题造成的？

问题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之一，是逐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以提高经济活力。^①那么，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信息机制等市场机制在实现产品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其作用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问题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需求指的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产品意味着厂商需付出更高的成本，消费者也因此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如果因产品质量标准过高而超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难以形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导致企业因无法获利而没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呈现“二元”分布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差异对于产品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约束作用？

问题四：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政府严加管理，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奶制品市场监管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与政府的质量监管是什么关系？政府质量监管不够严格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加强监管？是因为政府有意不作为，还是缺乏监管能力，或是有别的原因？政府的质量监管与尊重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有效平衡？

然而，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散见于部分文章之中，尚未对上述问题作出系统的解释，这表明理论研究的进展与现实需要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前，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质量监管上，而没有建立一套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制度体系是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加强产品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包括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进行总体评价、产品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质量监管的效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产品质量发展模式。

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①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需要，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以“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作为选题，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现有产品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现状，探索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设计出适合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模式，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二、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的现实需要，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发展迅猛，但长久以来，产品质量问题一直被视为技术问题。^①其主要从微观质量领域（企业层面）开展质量管理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产品质量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十分有限，而且现有的少量研究成果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仍然难以操作。

本书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理论研究现状及实践发展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长效机制等方面作了创新性研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密切结合我国国情，设计了旨在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产品质量理论的研究，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有利于推动我国产品质量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二) 实践意义

目前，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日益引人注目，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各质量发展主体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现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探讨适合我国国情且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并设计出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体系。本书通过对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机制以及收入分配等内在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应在尊重市场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措施，为政府制定产品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规划等提供思路借鉴。因此，本书对于推动我国产品质量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① 郭克莎. 质量经济学概论.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产品质量发展的研究，从文献上可以概况为五个方面：一是从产品质量与经济的关系出发，对于质量经济性的研究；二是关于市场结构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三是关于信息传递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四是关于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五是关于政府质量监管是否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争议。

（一）质量经济性：关于产品质量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随着产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层面这一微观领域对产品质量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质量经济性的研究即为其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质量经济性的思想由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首提，他在《朱兰质量手册》中提出，质量对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有影响的，并阐述了“质量与收益”、“质量与成本”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最佳质量水平等问题，朱兰关于质量经济性的论述在质量研究领域中占据了基础性地位。

关于产品质量与收益的关系。朱兰认为，随着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质量收益是不断上升的（如图 1-1），其原因主要有：第一，由于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企业及其产品会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这就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增加产品销量和市场份额，企业也因此可以增加盈利；第二，优质产品可高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水平，因此可以增加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第三，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的废品和次品就会不断减少，因此减少了企业的损耗，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第四，产品质量提高了，意味着减少了因退货带来的外部损失，降低了销售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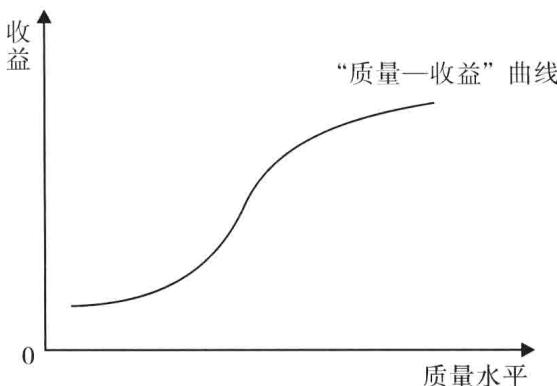


图 1-1 产品的“质量—收益”曲线

关于产品质量与成本的关系及其最佳质量水平的确定。朱兰认为，产品质量成本可归为两类：一是保证成本，包括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其中预防成本是指用于预防质量事故或质量缺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如质量培训费、质量评审费等，而鉴定成本是指在诊断产品是否符合标识的质量要求的过程中所花费的耗材费、人员费等费用支出；二是故障成本，包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其中内部损失成本是指在产品交付给消费者之前，因不能满足产品质量要求所造成各种损失，如报废损失、返工损失等，而外部损失成本是指在产品交付给消费者后，因不能满足质量要求所造成的损失，如运输损坏、召回成本等。朱兰认为，当产品质量水平提高后，故障成本（包括外部损失成本和内部损失成本）降低，而保证成本则不断增加，这时存在一个最佳质量水平，即在这一点上故障成本和保证成本之和最小。根据该经典模型的观点，超越最佳质量水平点的质量改进努力，尽管可能会提高质量水平，但也会导致总质量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如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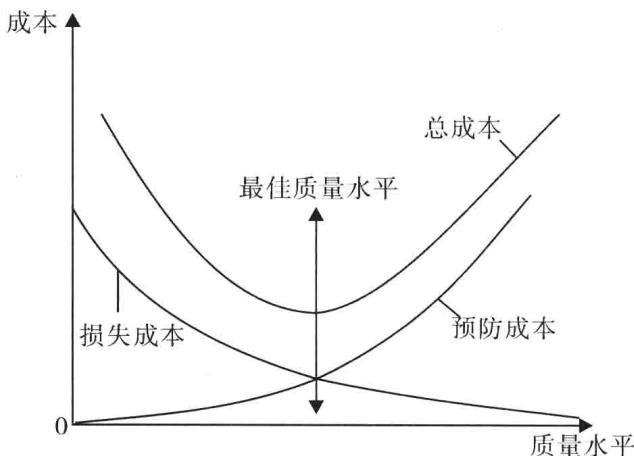


图 1-2 最佳质量水平的成本模型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日本产品不断威胁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开始反思与日本相比在产品质量上的差距，并由民间自发组织了各种声势浩大的质量运动。在此期间，著名质量管理专家克劳士比提出了“质量免费”的论断，认为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成本总是小于边际效益，因此，质量改进总是能带来收益的，企业应更加注重提高产品质量。1987年，美国质量管理协会主席J.哈林顿强调从营销角度对质量成本进行重构，注重减少包括用户损失、因用户投诉影响企业声誉在内的间接不良成本。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又对质量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重新思考。1998年，国际标准化机构颁布了《ISO10014：质量经济性指南》，提出应从平衡质量成本和质量收益两

个方面来把握质量经济性。

（二）关于市场结构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

许多文献从市场结构和企业决策的视角，对企业产品质量决策如何影响消费者福利进行了研究，部分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的垄断程度，对提高产品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Shaked & Sutton, 1982, 1983；Tirole, 1988）。在解释为什么垄断程度对质量水平有正向推动作用时，许多文献研究认为，在市场垄断程度较高的条件下，无论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为零（Shaked & Sutton, 1982；Tirole, 1988；Donnenfeld & Weber, 1992, 1995）、成本递减（Shaked & Sutton, 1983）还是成本递增（Ronnen, 1991；Motta, 1993；Boom, 1995），寡头博弈都会使厂商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因为高质量产品可以带来高利润，因此，垄断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垄断程度与产品质量的关系受到诸如法治程度、政府的中立性、消费者的抗衡力量等因素的影响。平新乔、郝朝艳（2002）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出发，在对中国假冒伪劣现象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市场结构如何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认为市场上之所以假冒伪劣产品难以根治，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余时飞（2010）通过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不同，我国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通过其先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制度等创新因素所致，而更多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配给或者是企业寻租的结果。这种人为的、低效率的市场垄断所导致不合理的高价和超额垄断利润，使得产品质量不仅没有得到很大提高，反而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

鉴于信誉在产品质量供给中的重要性，有不少文献讨论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厂商会重视并维护其信誉，以及市场结构对信誉机制和产品质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杜创（2009）在对 Tirole（1988）模型进行简化的基础上，对消费者与厂商之间作了一个博弈分析，认为不论市场结构如何，厂商愿意维持信誉的两个前提条件是：一是产品价格要足够高（至少要高于成本），能够获取“信誉溢价”；二是贴现因子不能太低，即厂商要有足够长远的眼光，而不是追求短期行为。Kreps、Wilson（1982）、Milgrom 和 Roberts（1982）通过分析认为，“信誉溢价”模型虽然能解释厂商信誉的决策问题，但无法刻画信誉和品牌的动态变化。Cripps et al.（2004, 2007）对垄断市场的信誉问题进行了论证，其方法是，假设在市场中只有一家厂商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厂商的收入会随着消费者对厂商及其产品的评价而发生变化，消费者经过多次重复博弈之后，其评价最终会收敛，进而会抑制厂商提高质量的动力，因此得出“如果市场是垄断的，信誉效应则是暂时的”这一结论。针对垄断市场上信誉的短暂性问题，Mailath 和 Samuelson（2001）提出了一种解决方

案，即保持产品品牌的相对稳定性，产品品牌不会随着具体负责运营企业主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厂商及其产品的评价也会保持相对稳定，这有助于厂商维护产品信誉，进而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产品的多元化，Wernerfelt (1988) 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品牌扩张可以视为产品质量提升的信号；杜创 (2009) 认为，因为厂商在维持信誉方面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当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生产多元化产品时，由于任何一个产品信誉上的丧失都会影响消费者对同一厂商其他产品的信任，因此，厂商具有维持信誉的积极性。解决垄断市场信誉短暂性问题的第三个方案是引入竞争，Horner (2002) 指出，竞争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时在众多厂商中进行选择，此时，一个厂商及其产品质量被认为多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超过其竞争对手，因此，竞争可以更好地激发厂商对于维持信誉的动力。Rob 和 Fishman (2005) 通过构造模型分析，认为越老的品牌越珍惜其来之不易的信誉，因此会加倍付出努力，其消费者人数和企业规模会更大，产品质量也会稳步提高。

(三) 关于信息传递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西蒙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信息经济学从信息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存在外部性、垄断或信息不完全等情况时，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将出现失灵。Akerlof (1970) 以旧车市场为例，分析了由于汽车质量信息在买卖双方非对称分布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指出如果消费者不能确切知道产品的质量，而只能根据统计特征来推断产品质量的高低，并且按统计推断的平均质量来给出价格水平，那么卖方只会出售质量低于价格反映的平均质量的次品。但卖方的这一行为会被后来的买方估计到，一个卖者降低质量的行为会降低买者对整个市场上产品质量的推断结果，进而导致产品的平均质量水平下降，市场萎缩，甚至会消失。Akerlof 的研究开创了信息传递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市场价格机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关注。

Nelson 等 (1970) 根据消费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产品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三类，其中搜寻品是消费者在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质量的产品，经验品是只有在使用以后才能获悉质量信息的产品，信任品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全部质量信息的产品。

Spence (1976) 的研究认为，如果产品质量信息能在买卖双方之间有效传递时，那么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对厂商也能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使得厂商更加有动力提供高质量产品。由于搜寻品的质量信息容易识别，消费者只要付出少量的信息搜寻成本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质量，因此，买卖双方关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就不会很严重，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将得到有效

发挥，此时政府无须过多直接介入，只需要采取措施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即可。

就经验品而言，由于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难以对其质量作出判断，因此，他们不会为标榜高质量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如果缺乏其他条件的支持（如有效的第三方认证、政府担保等），厂商将没有足够的动力提高经验品的质量水平，从而导致安全、优质的产品退出市场。相反，如果厂商通过采取质量认证、质量担保等措施，使得消费者在消费前就能低成本地获得产品的质量信息，则会增加购买意愿（Bagwell & Riordan, 1986）。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要求厂商按照规定如实披露产品质量信息、通过第三方质量认证、质量担保等，这将有助于减轻经验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交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信任品的特征是即使在消费之后也难以获取，至少在短期内很难确定该产品的安全性，只能通过长期观察，才有可能获取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因此，信任品的质量安全信息获取成本无论在消费前还是消费后都很高。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支持，消费者不愿意“冒险”购买，厂商也就没有相应的供给“激励”，容易导致信任品市场的萎缩。因此，为保证市场上质量信息的有效性，以质量安全为主要特征的信任品信息必须由政府或其他权威的中介组织来提供（Caswell & Mojdzska, 1996）。

国内学者对于因信息不对称而对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谢识予（1997）在国内较早探讨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假冒伪劣现象，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假冒伪劣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且具有一定稳定性，当某个领域因垄断等原因而存在进入壁垒时，而且如果消费者所购买的质量信息难以识别的话，则更有可能出现假冒伪劣现象。冯海、王龙宝（2005）则从产品信誉的角度研究竞争性行业中的产品质量信息问题，认为产品质量信息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当前困扰产品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如果厂商能够重视产品信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问题。平新乔、郝朝艳（2002）则运用统计数据对中国假冒伪劣现象进行了检验，认为 Akerlof 关于劣质品导致市场萎缩的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但这种作用被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却仍然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冲动给隐蔽了，这一结论与中国假冒伪劣现象持续猖獗的事实相吻合。谢地、孙志国（2010）从法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畅通产品质量信息传递渠道有助于产品质量监管者和消费者及时、正确了解产品质量信息，因此，对产品质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关于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讨论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方面，Gabszewicz 和 Thisse（1979）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首先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呈均匀分布，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双寡头垄断非合作博弈模型，并分析了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对厂商制定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决策的影响。随后，Shaked 和 Sutton (1982) 从需求的角度讨论了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消费者收入存在差异，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产品价格往往也会上升，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消费者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因此，收入差距加剧会降低整体社会福利水平。

上述关于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消费者的收入分配呈均匀分布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与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Chatterjee 和 Raychaudhuri (2004) 首先假定消费者收入分配呈正偏态分布，然后分析厂商是如何根据消费者的收入分布状况进行产品质量决策的，研究表明，垄断市场上之所以有低质量和高质量产品同时存在，消费者收入不平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不过，如果消费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那么一旦低质量产品的厂商退出市场，将会影响到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除此之外，Acharyya (2005) 在分析存在消费者收入约束条件下垄断厂商的产品质量决策行为时，认为垄断厂商可能会采取产品质量歧视措施，即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提供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这样可以实现总收益最大化。

史晋川、吴晓露 (2002) 通过对“三菱帕杰罗事件”的考察，在建立产品质量标准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剩余模型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在制定产品质量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时，应该将最优产品质量（缺陷）标准看作由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状况等内生决定的结果，其最优均衡值也受消费者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照搬美、日等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将对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剩余等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整体国民福利水平。

何立华 (2009) 认为，消费者因为收入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收入—质量”边际替代率，其中收入低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收入边际效用”，或具有较低的质量偏好。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行业多、地域广，在消费者质量识别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且政府加大质量监管的情况下，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因而存在较低的市场均衡产品质量。

文建东 (2010)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产品质量缺陷是与低收入联系在一起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大规模低收入群体是我国产品质量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总体上人均收入有了跨越式提高，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低收入人群由于受收入约束，对价格便宜的低质量产品有着一定的需求，所以市场上低质量产